

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与 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

龚文娟, 彭远春, 孙 敏

摘要: 在“社会化”论和“社会结构”论看来, 母亲与环境的亲密关系浑然天成。那么中国的母亲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表现得更环保、更亲环境呢? 本文使用 CGSS2013 数据, 勾勒了中国母亲群体的日常环境行为图景, 并基于对客观结构和主观感知与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关系的考量, 在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等关系维度上, 探讨了中国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发现, 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父亲表现得更积极, 非母亲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都表现得比母亲群体更积极; 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受教育年限等对母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作用; 媒体使用、社会交往亦通过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 中国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受到来自环境污染感知的多路径、复杂性影响。母亲群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是推动生态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为此, 应激发母亲群体的“亲环境”意识, 以此推动生态型社区/社会的建设及绿色消费生活的普及; 同时, 在公共政策设计上, 为不同生命周期的母亲群体提供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保障。

关键词: 母亲身份; 社会交往; 环境污染感知; 环境行为

中图分类号: D669.68-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2)01-0022-15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2.01.005

一、引言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 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平权运动等一系列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在“生态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 性别 (尤其是女性) 与环境的关系成为社会研究的主题^{[1][2][3][4]} 和政治舞台中的核心议题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异^{[4][5][6][7]}, 但在既往研究中, 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存在方向和程度的不一致: 有研究认为, 女性在有关健康和安全的在地域性具体环境问题 (如核电污染、水污染) 上表现出比男性更强的环境关心^{[1][8](P125-152)}; 在部分研究中, 男性对泛化环境问题的关心水平高于女性, 而在另一些研究中, 女性对泛化环境问题的关心水平高于男性^{[2][9]}。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来自北美的经验研究较为一致地支持女性比男性更为关心环境^{[7][10]}。有意思的是, 学者们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3) 环境模块数据, 通过分析使用修订后的 NEP 量表发现: 在 21 世纪初, 中国男性比女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宁青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的社会学研究”(17BSH155)

作者简介: 龚文娟,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福建 厦门 361005); 彭远春 (通讯作者),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pyc9600@126.com (湖南 长沙 410075); 孙敏,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

致谢: 感谢美利坚大学肖晨阳教授、厦门大学蔡浩群教授及匿名审稿人给予本文的宝贵意见! 文责自负。

性表现出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11][12][13]}。

差异性环境关心是否会转换成差异性环境参与行为呢? 事实上, 既往研究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支持环境参与行为中的性别差异。Blocker 等通过分析 1993 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发现女性虽比男性更关心环境, 但女性并没有比男性表现出更积极的环境行为^[2]。有研究支持环境参与行为中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14], 而另有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积极的环境参与行为^[15], 还有研究则发现男性的环境参与行为多于女性^[16]。在支持环境参与行为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中, 部分研究认为, 环境参与行为中的性别差异并不是环境关心性别差异的后果, 而有可能是家庭劳动分工和公共事务参与状况的后果。如 Mohai 通过全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虽然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略高于男性, 但她们的环境参与行为水平显著低于男性, 这与女性的政治生活状况类似^[1]。Xiao 等则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 虽然中国女性环境关心水平低于男性, 但在家庭内的环境参与行为方面女性高于男性^[13]。如果环境参与行为受到家庭劳动分工和政治参与行动水平的影响, 那么是否可以推论: 承担家庭成员照护和家务劳动更多的母亲群体^[17]与其他非母亲群体在环境参与行为上存在差异。这亦是本研究拟讨论的主题。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即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而这些目标的实现, 依靠的是亿万普通生活者。“一个关键问题是要确定社会中哪些成员更为关注环境问题、更为支持环境保护, 以便把握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 挖掘环境保护的社会动力以及更加有效地培育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18](P3)} 21 世纪以来, 国内研究者着手用国际通用量表测量并研究中国公众的环境关心和参与行为, 考察其性别差异, 发现公众具有一定水平的环境关心, 男性的环境关心水平高于女性; 女性在家庭内的环境参与行为多于男性, 而在家庭外的环境参与行为无显著性别差异; 年长者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倾向于表现出更多亲环境行为, 较高水平的环境知识可转化为亲环境行为^{[11][13]}。但针对母亲这一庞大的生活者群体的环境行为, 目前鲜有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拟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回答以下问题: 在中国社会中, 母亲与其他社会成员(如父亲、作为非母亲的女性等)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环境行为是否存在差异? 如果存在差异, 母亲群体会表现得更积极吗? 哪些因素促进或抑制了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母亲身份与环境行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基于社会化理论^①, 学者们提出“父母亲身份假设”(Parenthood Hypothesis), 用以描述和检验父母亲角色是否差异性地影响人们的环境关心和环境行为^{[1][8](P125-152)}。理论家期望“父母亲身份”能明显区分两性在环境关心和环境行为方面的表现: 母亲更关心她们孩子和家人的健康, 因此更关心环境; 父亲更关心家庭物质福祉, 而较少关心环境^{[8](P125-152)}。实证研究结果并未完全支持“父母亲身份假设”, 如有孩子的女性在环境以及与风险相关的问题方面, 相对于有孩子的男性和没孩子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关心^[5]。Hamilton 在研究父母亲身份对有毒废物污染的关心程度中发现, 有孩子的女性是关心度最高的群体^[19]。另有研究则发现父母亲身份

① 社会化理论认为, 漫长的社会化历程赋予了女性, 尤其是母亲“施爱者”角色。母性意识在女性生育子女后被激发出来, 逐渐形成利他、宽容、慈爱、合作等优良的母性品格。而社会化历程赋予男性, 尤其是父亲“养家糊口者”角色。积极进取、获取物质财富、市场性等被视为男性品格。

对环境关心的直接影响不显著^[11],对男女两性的气候变迁关心没有差异性影响^[3]。在环境行为的差异方面,父母亲身份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如果加入性别变量,考察“性别/父母亲身份”的交互影响作用,发现成为母亲会明显降低中国女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行为参与水平,而成为父亲对男性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行为参与水平影响不大;在公共领域内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父母亲身份都是限制性因素^[13]。此外,有关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女性在私人领域实施的环境行为多于男性,但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表现方面并不存在性别差异^{[6][7][20]}。

基于社会化理论,我们假设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方面,母亲与父亲、母亲与非母亲女性的表现存在差异,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 1a: 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母亲比父亲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假设 1b: 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母亲比非母亲女性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作为社会结构论^①的延展,学者们提出“生命历程自主度”(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概念,用以解释个体在参与环境行为时能自由安排时间和资源的能力和程度,如自由安排时间、可得性资源等系限制或促进个体环境行为的潜在要素^{[21][22]}。母亲角色和家务劳动者角色将女性捆绑在家庭责任上——尤其是家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多子女家庭中的母亲——她们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参与家庭外的公共事务;反过来,较少参与公共活动又削减了母亲们成为公共组织成员的机会和可能性,进而抑制她们获取更多资源^[1]。从“资源可及性”(Resources Availability)角度来看,这些因素都会抑制母亲在公共领域实施环境行为。女性比男性要面临更多的问题(如家庭、社会与政治参与的平等性),她们需要分散精力和资源去应对这些问题^[1]。因此,基于社会结构论及其延展观点,我们假设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方面,母亲与父亲、母亲与非母亲女性的表现存在差异,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 2a: 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父亲比母亲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假设 2b: 在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表现上,非母亲女性比母亲实施更多环境行为。

“社会化”论与“社会结构”论部分地解释了社会角色对女性/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1][15]}。女性和男性在物质经济(工作)和道德(体面)上各自占据的经济体中的空间是不一样的,这定义了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中的不同价值和地位^{[23](P127-163)}。物质与道德因素交织,为女性编织了比男性更严密的社会期待网,将她们固定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在照顾家庭成员和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母性品格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家庭生活赋予有孩子的女性至少两种角色——母亲角色和家务承担者角色。随着现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参与度的加深,她们由过去的“主内”逐步变得“内外兼修”,这使得有孩子的女性可能还要承担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角色。与此同时,附着在不同角色上的各类资源也加紧了彼此间的竞争,如母亲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由此给有孩子的女性带来诸多角色冲突。进一步,我们讨论两种角色——父母亲角色和职业角色——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1. 父母亲角色假设。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孩子的影响,进而将生活重心偏向于家庭。孩子对母亲的影响大于父亲^[24],而母亲通常承担更多的儿童养育任务,“成为父母亲”(Being A Parent)对女性的限制往往大于男性。基于对子女健康及生活环境质量的关心,“父母角色假设”(Parental Roles Hypothesis)认为,母亲比父亲以及其他女性展现出更多环境关心^[5]。有关环境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父母亲角色对公私领域的环境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综合考察“性别/

^① 社会结构论认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如同工不同酬。工作岗位性别化甚至迫使女性在成为母亲后,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劳动分工强化了早期社会化中的性别导向。绝大多数女性,尤其是母亲,或以家庭为中心,或从事与照顾、施爱有关的职业。

父母角色”影响时发现,成为母亲会明显降低女性的综合环境行为参与水平。在公共领域环境参与与行为方面,父母角色对男性和女性都是限制性因素^[13]。此外,不同的父母角色扮演状态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也会不一样,例如家有独生子女与家有多子女、家有6岁以下需要照顾的幼童与家有6~17岁孩子及孩子已满18周岁的家庭,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儿童照料过程中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不一样,在环境行为的表现上也会存在差异。限于资料,我们尝试通过子女数量来检验父母角色假设。

假设 3a: 家有多子女需要照顾的母亲,更多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3b: 家有独生子女需要照顾的母亲,更多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3c: 家有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更多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3d: 家有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母亲,更少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2. 职业角色假设。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否与母亲角色和家务承担者角色产生竞争关系,进而对养育孩子的女性的环境关心和行为产生影响?结论不一。有研究认为,在家庭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导致人们更关心经济问题,而更少关心环境问题,这不分男女^[5]。也有研究认为,全职在外工作的人比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更关心环境问题^[1]。还有研究认为,与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并养育有未成年的孩子,降低了女性从事公共环境行为的可能性,但如果女性有一份有酬工作并不会降低其公共环境行为参与率。如果与其他成年人共同生活并且没有一份有酬工作,会增加女性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22]。综合考虑资源可得性和生命历程自主度,我们假设职业角色带来的观念和资源差异可能导致母亲群体在不同领域内的差异性环境行为,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 4a: 无工作的母亲相比于参与劳动力市场有薪酬工作的母亲可能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4b: 参与劳动力市场有薪酬工作的母亲相比于无工作的母亲可能实施更多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4c: 具有管理职位职业的母亲更多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4d: 具有管理职位职业的母亲更多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二) 社会交往与环境行为

环境行为既是行为主体对客观环境状况的能动反应^[25],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期待、地区差异、信息分割等外在结构性因素投射在行动者身上的表现^[26],还是资源、机会和特殊技能等行动控制条件约束的产物^[22]。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不能,也从来没有脱离这些客观状况、期待与约束而独立地存在过。

从常人方法论的角度理解,母亲的环境行为是一种日常的、策略性地在不断互动中达成的成就。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互动能够通过帮助个体获取和传播环保信息,促进环保行为的学习,从而有助于行动者改进环保行为^[27]。本研究拟从两方面考察母亲的社会交往状况:一是母亲日常与他人交往密度(包括邻居和朋友),二是媒体使用情况。公众被动员参与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越有助于其对环境问题或环保信息的沟通和交流。社会网络关系增加了公众个体被社会关系动员起来参与的概率^[28]。据此,我们假设社会交往密度有助于提升母亲的环境行为,具体如下:

假设 5a: 母亲的社会交往密度对其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有显著性影响,社会交往密度越大,越有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5b: 母亲的社会交往密度对其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有显著性影响,社会交往密度越大,越有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作为信息传播重要中介的媒体,在环境行为计划的形成中扮演“传递者”和“塑造者”角色,但很难说媒体使用就“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人们的环境友好行为。有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

越多的个体越倾向于讨论环保议题并产生环保行为,新媒体使用强度越强的个体参与环保活动越积极^[29]。另有研究则认为,媒体使用虽能提升公众的环境问题关注度,但关注度上升并不足以促使公众开展实际的环境友好行为^[30]。有研究甚至认为,直接的媒体接触对公众的环境友好行为具有负向作用^[31]。传统媒体具有单向传递信息的特点,尤其是各级官方传统媒体兼具宣传教育功能,而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具有双向/多向信息流动的特点。有研究发现,传统媒体接触强度对于公众环保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互联网接触强度则无显著影响^[32],传统媒体使用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动员效果显著高于新媒体^[33]。考虑到不同媒体对不同领域中的环境友好行为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我们假设:

假设 6a:传统媒体使用强度促进母亲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6b:传统媒体使用强度促进母亲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6c:新媒体使用强度抑制母亲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即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不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6d:新媒体使用强度抑制母亲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即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越不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三) 环境污染感知与环境行为

跨国研究发现,在污染相对严重的国家,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表现得更为积极^[25],环境污染暴露可能比社会化和文化因素更明显地影响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和反应^[34]。“环境污染驱动假说”应运而生,即环境质量下降,影响公众的生活甚至生命质量,公众采取相应行为应对环境污染。在污染驱动假说中,公众对污染的体验不容忽视,即公众环保意识在感知到环境污染严重之后开始觉醒,从而采取各种环保行为来减少环境污染。一项针对中国西北农村地区的研究也发现,环境危害经历对于提升中国西北地区农村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总的频次有显著影响^[35]。此外,居民健康状况对其获取环境健康知识、采取亲环境行为也有显著影响^[36]。环境污染和公众对污染的体验在不同层面上双管齐下影响公众环保行为:微观层面,环境污染感知、环境知识对个人的环境保护行为有显著影响;宏观层面,污染物排放指标对个人的环保行为影响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调节作用^[37]。污染驱动假说提出环境污染及公众污染体验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那么,这一假说在母亲群体中是否得到稳健的支持呢?

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看,母亲经历了怀孕、生产、哺乳等特殊生理阶段,与后代血脉相连。相比父亲,母亲群体对待后代更为关注和无私^[38]。因此,对环境变化(尤其是环境污染)的关心是女性关心家庭成员,尤其是母亲关心孩子健康的本能反应衍生出的结果之一。关注家庭成员健康安全的态度促进了女性(尤其是母亲)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关照态度,并产生相应行为^[39]。出于对后代保护的本能,母亲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十分敏锐,日常生活中的不良环境体验都可能引起母亲的警觉和应对行为,如1978年的“爱河事件”^①、2015年的“弗林特水危机”^②都是母亲们最早体验到并发现环境变化对家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进而行动起来引发社会关注。鉴于此,本文假设母亲群体对环境污染的体验正向影响其环境行为,具体假设如下:

^① 参见: E. C. Beck, The Love Canal Tragedy, EPA Journal, January 1979, <https://www.uwec.edu/files/1313/The-Love-Canal-Tragedy-About-EPA-US-EPA.pdf>。

^② 参见: 人民日报《美国弗林特水危机,“天灾”还是“人祸”?》,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17/c_128805875.htm。

假设 7a: 母亲感知到的环境污染越严重, 越有可能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7b: 母亲感知到的环境污染越严重, 越有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 解释框架

根据前文综述和分析, 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 是在日复一日的惯例化活动中, 对客观环境状况的能动反应, 也是在文化期待、规范制约和信息分割等约束下, 不断互动进而达成的成就^[40]。这些行动和成就不是发生在某些固定的“地点”, 而是发生在流变的“空间”中, 是一种生成性、关系性的空间实践^①。因此, 本文将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分别放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进行讨论, 并从母亲身份、社会交往和环境污染感知三个维度解释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以及文化规范, 尤其是存在于朋友、邻里、同事和其他社会群体之中的非正式网络交换, 影响人们选择性地感知某些环境问题, 而忽略另一些环境问题及其严重程度^[41]。人们在对其某类公众事务(如环境污染与环境风险)做出判断和评价时, 往往会参考身边其他人的看法。社会过程和群体动力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态度和看法, 身边人的观点会成为其感知的参照点, 同时他们又共享类似的文化观点。通过网络内的非正式互动, 人们对问题的感知和解释会被整合进更大的价值和解释框架中^{[42][43]}。所以, 本文认为母亲身份和交往互动维度的因素除了直接作用于环境行为, 还可通过影响环境污染感知这一内在感知, 间接作用于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基于这一考虑, 本文拟将环境污染感知作为中介变量, 考察母亲身份和社会交往互动维度变量通过环境污染感知变量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讨论的“母亲”不仅限于已育女性, 还包括养母和继母, 准确地说, 是获得母亲身份或母亲角色的女性, 她们有子女, 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因此, 这里的“非母亲”指未获得母亲身份的女性。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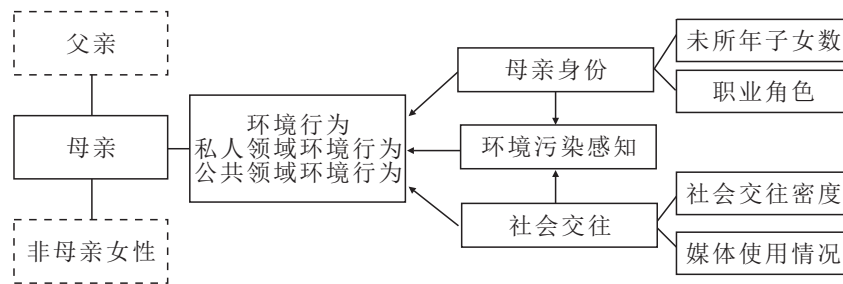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图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3)。该调查采用多级分层抽样方法, 在全国共抽取了 100 个县 (区), 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 5 个城市, 作为初级抽样单元; 再在每个抽中的县 (区) 内随机抽取 4 个居委会或村委会; 然后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中随机调查 25 户家庭; 最后在每个抽取的家庭中, 随机抽取一人进行面

^① 本文中的空间既指具体的功能性的物理空间, 也指以抽象符号为载体的社会空间。空间与实践相互成就, 空间为实践提供前提条件, 实践再造空间。在这个流变的空间中, 规则、资源、关系、认知、体验等要素交互形塑母亲群体的日常环境行为。

访。调查对象为18岁及以上成年人。CGSS2013有效样本为11 438人,应答率为72.17%,其中男性占50.3%,女性占49.7%。本研究测量变量主要来自问卷中的环境模块。根据本研究需要,我们剔除环境行为变量缺失情况严重的样本后,得到母亲样本数5 039个,占比44.4%;父亲样本4 778个,占比42.1%;非母亲女性590个,占比5.2%。

(三) 主要变量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母亲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内实施的环境行为,采用包含“垃圾分类投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装进行重复利用、为环境保护捐款、主动关注媒介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参加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或绿地、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或上诉”等十个题项的环境行为量表进行分析,依次询问了被访者在最近的一年里是否经常、偶尔或者从不从事相应的活动或行为。在分析中,将从不、偶尔和经常选项分别赋值为0、1和2。

信度分析表明,环境行为量表的alpha值为0.754, R_{i-i} 值在0.285~0.558之间不等,且在删除对应项目之后,alpha值普遍降低,即有着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另根据既有研究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区分及测量的结果^{[15][44]},本研究对环境行为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统计结果表明^①,环境行为涵括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两维度,前者由第1、2、3、4、6项构成,后者则由第5、7、8、9、10项构成。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的因子负载对相应项目进行加权累加,形成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两个变量。

2. 自变量。

(1) 母亲身份:通过测量“未成年子女数”和“职业角色”来考察。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的未成年子女数:“请问您有几个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 “职业角色”通过询问受访者的工作状况与在工作中的管理活动情况来测量,“只管别人,不受别人管理”和“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归为“管理工作”,“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和“既不管理别人,又不受别人管理”归为“非管理工作”,全职工作与非全职工作之外的情形则归为“无职业”,分别赋值为2、1、0。

(2) 社会交往:区分为线下交往和媒体使用两类。线下交往主要通过日常社会交往密度来测量,即考察被访者与邻居、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将回答选项“几乎每天”“一周1到2次”“一个月几次”“约一个月一次”“一年几次”“一年一次或更少”“从来不”相应赋值为6、5、4、3、2、1、0,缺省值赋值为中间取值3,进而将二者相加生成社会交往密度变量。媒体使用主要测量被访者在过去一年内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等媒体的频率,将“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相应赋值为1、2、3、4、5,缺省值赋值为中间取值3。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属于传统媒体,将其相加生成传统媒体使用变量。互联网、手机定制消息属于新媒体,将其相加生成新媒体使用变量。

(3) 环境污染感知:通过被访者依次对所在地区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工业垃圾污染、生活垃圾污染、食品污染等6个方面严重程度的判断进行分析,将“没有该问题/不严重”“不太严重”“一般/没关心/说不清”“比较严重”“很严重”回答选项相应赋值为1、2、3、4、5。信度分析表明,该量表的alpha值为0.831, R_{i-i} 值在0.511~0.671之间不等,且在删除对应项目之

^① 卡方值=647.627、 $df=29$ 、 $p=0.000$ 、 $GFI=0.989$ 、 $CFI=0.977$ 、 $IFI=0.977$ 、 $NFI=0.976$ 、 $RMSEA=0.043$,故模型具较好的拟合度。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对应题项的因素负载相应为0.55、0.70、0.37、0.28、0.63,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对应题项的因素负载相应为0.56、0.81、0.80、0.43、0.55;且两因子间的相关关系较强,为0.61。限于篇幅,模型图和相关结果未呈现,读者若有兴趣,可联系作者索取。

后, alpha 值均降低, 即有着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另根据既有研究对环境问题体验维度划分与测量结果^[5], 本研究对环境污染感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统计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感知具单一维度。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获得的因子负载对相应项目进行加权累加, 形成环境污染感知变量以纳入后续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4) 鉴于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与环境行为的关联在既往研究中得到了证实^{[18](P3)[44]}, 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将年龄、教育年限、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各变量的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表

变量	性质	说明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5, 均值为 1.90, 标准差为 1.20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6.30, 均值为 0.62, 标准差为 1.06
未成年子女数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5, 均值为 0.51, 标准差为 0.75
职业角色	定类变量	管理者=2、非管理者=1、无职业=0
社会交往密度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12, 均值为 6.58, 标准差为 3.32
传统媒体使用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4, 最大值为 20, 均值为 9.39, 标准差为 2.82
新媒体使用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2, 最大值为 10, 均值为 3.34, 标准差为 2.05
环境污染感知	连续变量	最小值为 4.03, 最大值为 20.15, 均值为 9.29, 标准差为 4.29
年龄	连续变量	均值为 50.78, 标准差为 14.94
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未受过正式教育=0、小学/私塾=6、初中=9、高中/职高/中专/技校=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 均值为 7.46, 标准差为 4.15
收入	连续变量	将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均值为 3.77, 标准差为 1.35

(四) 分析策略

首先, 本研究通过对环境行为进行组间均值比较, 检验父母、女性群体内母亲与非母亲、拥有多子女母亲和独生子女母亲、未就业母亲与就业母亲、从事管理工作母亲与非管理工作母亲等群体之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步,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检验母亲身份、社会交往与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 第三步,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探寻各因素影响母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

四、分析与发现

(一) 母亲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环境行为差异比较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母亲身份是否对行动者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笔者对母亲、父亲和非母亲女性等群体的环境行为得分进行了均值比较, 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数据显示, 母亲与父亲在实施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假设 1a 未获支持), 父亲较母亲实施更多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2a 获支持); 与非母亲女性相比, 母亲实施更少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与假设 1b 方向相反, 假设 2b 获得支持); 相比拥有多子女的母亲, 拥有独生子女的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与假设 3a 相反, 假设 3b 获得支持); 就业母亲较非就业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与

^① 卡方值=53.999、df=36、p=0.000、GFI=0.996、CFI=0.995、IFI=0.995、NFI=0.995、RMSEA=0.040, 故模型具较好的拟合度。当地环境污染感知对应题项的因素负载相应为 0.74、0.70、0.72、0.69、0.61、0.57。模型图如图 2 所示。

假设 4a 方向相反, 假设 4b 获得支持); 相比从事非管理工作的母亲, 从事管理工作的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4c 和 4d 获得支持)。

综上, 除了父母角色在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 其他角色在公私领域环境行为上都呈现了显著差异。初步分析显示, 中国母亲群体在环境行为方面并未表现得比其他群体更积极, 且母亲群体内部, 不同生命周期、不同就业状态的母亲, 其环境行为表现存在差异。私人领域内的母亲环境行为表现并没有支持社会化理论及其延展假说, 相反, 非母亲群体反而在私人领域内的环境行为上表现得更积极, 这值得我们反思“与生俱来”的本能说是否能解释中国母亲的环境行为。

表 2 母亲与其他群体环境行为的均值比较

群组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N
	均值	T 值	均值	T 值	
组 1					
父亲	1.864	1.413	0.634	6.657***	4778
母亲	1.830		0.497		5039
组 2					
非母亲女性	2.453	12.259***	1.026	10.337***	590
母亲	1.830		0.497		5039
组 3					
拥有独生子女的母亲	2.208	20.139***	0.707	12.937***	2127
拥有多子女的母亲	1.551		0.342		2903
组 4					
就业母亲	2.222	15.460***	0.782	12.059***	1495
非就业母亲	1.664		0.376		3544
组 5					
从事管理工作的母亲	2.553	5.045***	1.145	4.910***	271
从事非管理工作的母亲	2.155		0.706		1210

注: *** $p < 0.001$ 。

(二) 母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如表 3 所示), 未成年子女数对母亲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都无显著影响, 假设 3c 和 3d 未获支持。在加入社会交往密度、媒体使用和环境污染感知变量后, 职业角色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消失, 而从事管理工作、参与劳动市场的母亲实施更多的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社会交往维度上, 社会交往密度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并无显著影响, 假设 5a 未获支持; 但对其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即母亲的社会交往密度越大, 越有可能实施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5b 得到验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都有助于母亲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 假设 6a 和 6b 得到验证, 与假设 6c 和 6d 方向相反。环境污染感知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 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即母亲体验到的环境污染越严重, 越有可能实施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假设 7a 和 7b 得到验证。

从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来看, 在逐渐纳入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等因素之后, 模型解释力逐渐加大, 说明二者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实施产生影响。在纳入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等因素之后, 职业角色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 意味着其可能通过媒介使用、环境污染感知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产生间接影响。从模型 4、模型 5、模型 6 来看, 在逐渐纳入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等因素之后, 模型解释力逐渐加大, 说明二者对母亲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实施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教育年限对母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存在较大影响, 即无论公私领域, 受教育年限越长的母亲群体越可能实施环境行为。年长者、收入越高者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

表 3 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对环境行为的预测 (OLS 回归)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未成年子女数	-0.011 (0.026)	-0.006 (0.025)	-0.001 (0.025)	-0.022 (0.023)	-0.016 (0.022)	-0.014 (0.022)
管理者	0.037** (0.072)	0.005 (0.070)	-0.003 (0.069)	0.101*** (0.062)	0.074*** (0.062)	0.070*** (0.062)
非管理者	0.026# (0.041)	0.001 (0.039)	-0.010 (0.039)	0.058*** (0.035)	0.039* (0.035)	0.033* (0.035)
社会交往密度		0.005 (0.004)	0.013 (0.004)		0.071*** (0.004)	0.075*** (0.004)
传统媒体使用		0.244*** (0.006)	0.215*** (0.006)		0.179*** (0.005)	0.162*** (0.006)
新媒体使用		0.146*** (0.009)	0.125*** (0.009)		0.147*** (0.008)	0.136*** (0.008)
环境污染感知			0.171*** (0.004)			0.094*** (0.003)
控制变量						
年龄	0.058** (0.001)	0.052** (0.001)	0.040* (0.001)	0.039# (0.001)	0.051* (0.001)	0.045* (0.001)
教育年限	0.434*** (0.004)	0.241*** (0.004)	0.204*** (0.004)	0.254*** (0.003)	0.100** (0.004)	0.080*** (0.004)
收入	0.060*** (0.010)	0.042** (0.010)	0.043** (0.010)	0.052*** (0.009)	0.042** (0.009)	0.043** (0.009)
调整后的 R ²	0.198	0.262	0.286	0.098	0.147	0.154
F	229.703	202.678	202.877	76.855	76.656	92.57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表内报告标准回归系数;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职业角色以无职业作为参照组。

(三) 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基于上文分析, 本文依据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图 1), 结合各变量的相应测量, 并删除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对中介变量不显著的路径, 构筑出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图 2), 进而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进行路径分析, 结果如表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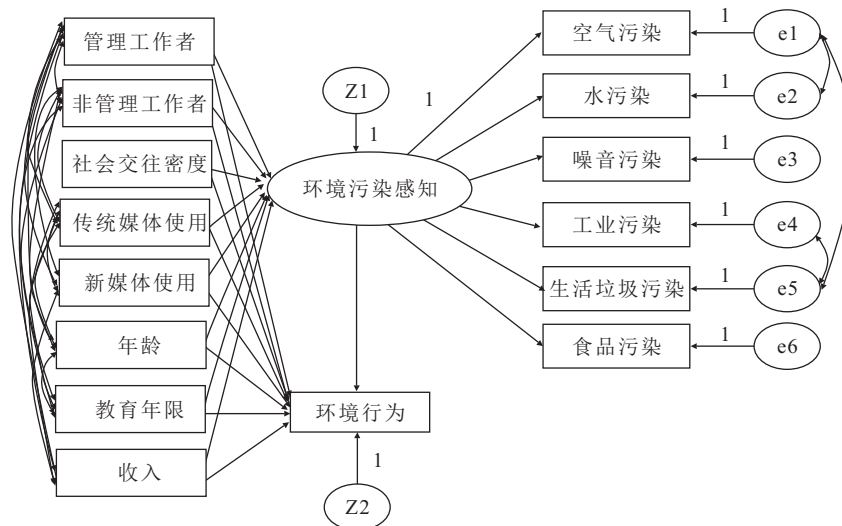


图 2 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表4 母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标准化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			公共领域环境行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管理工作	-0.005	0.010***	0.005	0.069***	0.006***	0.074***
非管理工作	-0.013	0.014***	0.001	0.031*	0.008***	0.039*
社会交往密度	0.016	-0.011***	0.005	0.077***	-0.006***	0.071***
传统媒体使用	0.208***	0.038***	0.246***	0.159***	0.021***	0.179***
新媒体使用	0.117**	0.026***	0.144***	0.130***	0.015***	0.145***
环境污染感知	0.199***	—	0.199***	0.110***	—	0.110***
年龄	0.036**	0.029**	0.065**	0.051**	0.011***	0.062***
教育年限	0.190***	0.048***	0.238***	0.073***	0.027***	0.100***
收入	0.044**	-0.002	0.042**	0.043**	-0.001	0.042**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基于 Bootstrap 法，抽取 5 000 次进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模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卡方值 = 649.024、 $df = 60$ 、 $p = 0.000$ 、 $GFI = 0.983$ 、 $NFI = 0.970$ 、 $IFI = 0.972$ 、 $CFI = 0.972$ 、 $RMSEA = 0.044$ 。母亲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模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卡方值 = 613.200、 $df = 60$ 、 $p = 0.000$ 、 $GFI = 0.984$ 、 $NFI = 0.970$ 、 $IFI = 0.973$ 、 $CFI = 0.973$ 、 $RMSEA = 0.043$ 。由此可见，两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职业角色虽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与总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借助环境污染感知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影响，并改变了总影响的方向，职场活动提升了其环境污染感知水平。相比全职母亲，参与职场劳动的母亲实施更多公共领域环境行为——无论其是否担负管理工作。

社会交往密度对母亲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实施无显著影响，但对其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社会交往密度无论对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还是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皆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即日常生活中与邻居、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越频繁，反而降低了环境污染感知水平。可能的解释是，如果身边的邻里亲朋大多对环境污染感知不敏锐，通过社会交往可能产生惯常的趋同与适应，进而降低行动者对环境污染的敏感度。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都有助于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实施。媒介接触有利于获取相关环境信息、环境知识等，并且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形成拟态环境，进而影响公众的环境污染感知水平。环境污染感知本身对母亲私人领域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实施有着显著直接影响的同时，职业角色、社会交往密度、媒体使用等亦借助其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母亲环境污染感知越强烈，其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实施环境行为的可能性越高，从侧面印证了环境污染暴露和体验影响人们环境保护行为的观点^{[34][35]}。职业角色和媒体使用，通过影响母亲的环境污染感知，强化母亲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环境行为，具体表现为，相比全职母亲，无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或非管理工作的母亲，对环境污染感知都更高，进而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有助于对环境污染产生更敏锐的感知，进而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此外，年长者、教育年限越长者，环境污染感知水平越高，亦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收入则更多对环境行为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传统文化将慈爱、保护、节俭、宽容、合作等品格定义为“好”母亲的标志，但“我们乐于称之为‘母爱’的东西实际上是与厌倦、不耐烦、愤恨和失望等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发人深省的矛盾

情感是母亲的标志”^{[45](P68)}。Ruddick 认为母亲身份的标志是关怀, 其本质并非“自我牺牲”。这种矛盾既体现在母亲在亲子关系中的日常表现, 也体现在母亲对待环境的行为中。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母亲对孩子的关爱发自本能, 是最纯粹和圣洁的, 但关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恰如人们调侃亲子日常是“不谈学习, 母慈子孝; 一谈学习, 鸡飞狗跳”, 母亲对环境的关注和行为也是随生态环境状况、生命历程、工作机会、价值观念、社会交往状况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的。

作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环境问题的发现者和体验者、家庭消费的主导者及子女的照护者, 母亲群体理应成为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本文聚焦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 基于对客观结构、主观感知与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关系的考量, 探讨了母亲身份、社会交往、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 以及母亲身份、社会交往借助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群体环境行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

第一, 与其他群体相比, 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并未表现得如假设一般积极。具体而言, 在公共环境行为上父亲表现得更积极; 非母亲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上都表现得比母亲群体更积极; 相比拥有多子女的母亲, 拥有独生子女的母亲实施更多的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资源可及性假设和生命历程自主性假设或许能为母亲的环境行为提供一定解释。资源可得性假设认为, 即便女性的环境关心高于男性, 但由于她们占据的社会位置整体上比男性低, 使得她们在参与环境行为方面缺乏必要的可得性资源, 如时间、对政治体系的了解程度、组织从属关系(包括附着在这些组织关系上的资源)等。因此, 女性作为一个群体, 比男性面临更多社会因素造成的问题, 如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及其衍生问题, 使得她们不得不把其注意力和资源分散到更多方面以应对这些问题。生命历程自主性假设认为, 行动者在生命不同阶段因工作和照顾家庭的需要和任务不同, 他(她)们参与环境行为的能力受到不同阶段社会角色和任务的形塑和可自由支配时间的限制^[13]。在针对妻子与母亲的社会福利供给不足的双重限定下, 女性的劳动负担依然重^[46], 父母身份限制了个体在参与环境行为时自由安排时间和资源的能力和程度^[22]。

第二, 就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 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的环境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职业角色、社会交往密度和媒体使用对母亲环境行为不仅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还通过环境污染感知对母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因此, 本文认为, 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受到污染体验、感知到的外在约束与控制及日常生活中交往实践的复合影响。母亲群体环境行为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污染暴露中的体验和感知, 还具有强烈的条件约束性, 即行为发生在时间、精力、资源、机会、社会规范、社会交往等一切可感知到的约束和控制之下, 此外, 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也是影响母亲环境行为出现差异化表现的因素。

“母性品格”在部分环境关心研究中得到验证^{[5][19]}, 但在本文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支持。制度安排、社会福利供给、家庭成员支持、媒体接触、社交互动等都可能影响母亲群体环境行为发生改变。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并不如我们假设的一样积极, 在对其影响因素的讨论中, 本文亦发现, “社会化”“社会结构”等工具并不能提供充分解释。母亲在不同时间(生命历程周期)和空间(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中实施的环境行为, 是在环境状况、文化期待、规范制约和信息分割等要素刺激下, 不断互动达成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具有生成性、关系性和流变性, 即并不是我们假设的那样——富于自我牺牲, 单纯的积极向上——而是不同时空中, 复杂因素多元路径作用下的变动性成就, 反过来它影响空间关系和社会结构。所以, 我们并不能推断, 母亲身份一定带来积极的环境行为。鉴于此, 要在全社会提升亲环境行为, 需要全方位的社会参与, 例如合理的制度设计(如三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 是否有配套的儿童照护福利制度)、环境教育终身化(基于受教育程度对环境行为稳定的正向影响)、理想化媒体表达对环境知识的传播等。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一,由于全国性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数据并非每一轮调查都能获取,尽管本研究选取了最近的全国环境模块数据,但当前中国母亲群体的环境行为或已发生变化,需要新一轮数据对其加以对比验证;其二,使用二手数据,无法对一些相关变量进行测量,如“家务承担者”“居住模式”等,也无法从质性研究的角度去获取对母亲环境行为背后故事的理解。作为生活者,每一个体的行为都事关环境质量改善,故关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环境行为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家庭作为消费领域主体之一,不但承担养育后代的功能,还承担赡养亲代的义务,在照护过程中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单位。中国具有比较普遍的“祖带孙”家庭照护模式,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居家养老亦可能拓展环境行为研究新议题,未来研究可立足家庭(如居住模式、生活互动等)考察环境行为。

参考文献

- [1] Mohai, P. Men,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gender gap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activism[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92(5).
- [2] Blocker, T. J., D. L. Eckberg.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ism: Results from the 1993 General Social Survey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97(4).
- [3] McCright, A. M. The effects of gender on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and concern in the American public[J].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10(1).
- [4] Xiao, C. Y., A. M. McCright.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trust hypothesis in the USA[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5(1).
- [5] Davidson, D. J., W. R. Freudenburg.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cern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vailable research[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6(3).
- [6] Dietz, T., P. C. Stern, G. A. Guagnano. Social structur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8(4).
- [7] Tindall, D. B., S. Davies, C. Mauboules. Activism and conservation behavior in and environmental movement [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03(10).
- [8] Greenbaum, A. Taking stock of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A]. D. M. Michael, O. Eric(E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C]. North York: Captus Press, 1995.
- [9] Van Liere, K. D., R. E. Dunlap. The social bas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 review of hypotheses,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0(2).
- [10] McCright, A. M., C. Xiao.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sights from recent work and for future research[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4(10).
- [11] 洪大用, 肖晨阳. 环境关心的性别差异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7(2).
- [12] 龚文娟, 雷俊.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关心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3).
- [13] Xiao, C. Y., D. Y. Hong.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China[J].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010(1).
- [14] Berenguer, J., J. A. Corraliza, R. Martin.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ttitudes, and ac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5(2).
- [15] Hunter, L. M., A. Hatch, A. Johnson. Cross-national gender variation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3).
- [16] Eisler, A. D., H. Eisler, M. Yoshida. Perception of human ecology: Cross-cultural and gender comparis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1).

- [17]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 2015 世界妇女:趋势和统计[EB/OL]. <https://unstats.un.org/>, 2021-01-01.
- [18]洪大用,肖晨阳.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9]Hamilton, L. C. Concern about toxic wastes: Three demographic predictors[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85(4).
- [20]Hadler, M., M. Haller. Global activism and nationally driven recycling: The influence of world society and national contexts on public and priv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11(3).
- [21]McAdam, D.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6(1).
- [22]Xiao, C. Y., A. M. McCright. A test of the 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 argumen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4(2).
- [23]Harlan, S. L., D. Pellow, J. T. Roberts, et al. Climate justice and inequality[A]. R. E. Dunlap, R. J. Brulle.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24]孙晓冬,赖凯声. 有儿子的母亲更传统吗? ——儿子和女儿对父母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J]. 社会学研究, 2016(2).
- [25]Inglehart, R. Public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Objective problems and subjective values in 43 societies[J].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95(1).
- [26]彭远春. 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8).
- [27]何兴邦. 社会互动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 CGSS(2013)的经验分析[J]. 软科学, 2016(4).
- [28]卢少云. 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与公共环保行为——基于中国 CGSS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17(5).
- [29]金恒江,余来辉,张国良. 媒介使用对个体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J]. 新闻大学, 2017(2).
- [30]Whitmarsh, L.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symmetry of intentions and impa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9(1).
- [31]Mikami, S., T. Takeshita, M. Kawabata. Influence of the mass media on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Japan[J]. *Asian Geographer*, 1999(1-2).
- [32]Östman, J. The influence of media use on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A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pproach[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14(1).
- [33]周全,汤书昆. 媒介使用与中国公众的亲环境行为:环境知识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多重中介效应分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 [34]Mohai, P.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most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J]. *Race, Gender and Class*, 1997(1).
- [35]卢春天,朱晓文. 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及行为适应——基于西北地区 4 省 8 县(区)的实证数据分析[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 [36]彭远春,曲商羽. 居民健康状况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基于 CGSS2013 数据的分析[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 [37]王玉君,韩冬临. 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与公众环保行为——基于中国 CGSS2013 数据的多层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2).
- [38]Alexander, R. 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4(2).
- [39]McStay, J. R., R. E. Dunlap. Male-female differences in concern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983(4).
- [40][英]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 李康,李猛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1998.

- [41] 龚文娟, 杜兆雨. 知行合一? 从环境问题感知到环境友好行为——环境知识、媒体使用与非正式网络沟通的调节作用[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 [42] Douglas, M., A.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M]. 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43] [美] 罗杰·卡斯帕森, 奥特温·雷恩, 保罗·斯洛维奇, 等. 风险的社会放大: 一个概念框架[A]. [美] 保罗·斯洛维奇. T 风险的感知[M]. 赵延东, 林土垚, 冯欣, 等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44] 彭远春. 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结构制约[J]. 社会学评论, 2013(4).
- [45] Ruddick, S.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
- [46] 杨菊华. 传统与策略: 1990—2010 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J]. 学术研究, 2014(2).

Motherhood, Social Interac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Chinese Mothers

GONG Wen-juan, PENG Yuan-chun, SUN Mi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of 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s and environment is natural. Are Chinese mother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n real life?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13,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aily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Chinese mothers. On account of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structure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mother groups in life practic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Chinese mothers in terms of motherhoo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thers are more active in the public domain, while non mothers are more active than mothers in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Media 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and education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impact on moth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In addition, media u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lso have indirect impact on moth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As a space practice in daily life, th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Chinese mothers are affected by multi-path and complexity fr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ociety to stimulate the "Pro-environment" consciousness of mother groups and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welfare security for mother groups in different life cycles.

Key words: motherhood; social interac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rcep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责任编辑 朱 蓓)